

十六国时期北方政治的新陈代谢

王明前

(厦门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十六国政治是在魏晋以来政治发展基础上,过渡到重新统一北方的北魏前,北方政治经历的一次新陈代谢。十六国政权在政治制度上整体延续了魏晋官制的时代特色,恢复魏晋以九品中正制为核心内容的选举制度,推行以“儒家化”为方向的文化建设和法制建设。为强调本民族的统治地位,五胡政权对占人口大多数且文化先进的汉族及所谓“杂胡”采用“胡汉分治”政策。十六国政治留给其历史继任者一个历史难题:如何在入主中原统治人口远远超过统治民族自身的汉族和“杂胡”时,在接受中原汉族政治制度和农业生产方式的同时,仍然能够使统治民族自身得到政治合法性。这不仅是留给统一五胡十六国的北魏的历史难题,也是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定数。

关键词:十六国;魏晋;儒家化;重农;胡汉分治

中图分类号:K23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5744(2013)01-0054-08

316年西晋灭亡,司马氏南渡建立东晋,中国北方陷于五胡十六国割据纷争时期,直到439年北魏攻灭北凉,北方才重新统一。史学界始终对十六国五胡政权的所谓“汉化问题”给予高度关注,一般认为落后的五胡入主中原接受先进的汉族文化对实现民族融合具有进步意义(相关研究著作只有以下三部具有不同程度的学术价值:陈勇《汉赵史论稿——匈奴屠各建国的政治史考察》,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赵向群《五凉史探》,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蒋福亚《前秦史》,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其他:周伟州《汉赵国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洪涛《三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齐陈骏等《五凉史略》,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洪涛《五凉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周伟州《南凉和西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杨伟立《成汉史略》,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均为一般历史读物。另可参见以下著作的相关章节:金毓黼《东北通史》,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80年;冯家升《冯家升论著辑粹》,中华书局1987年版;张博泉《东北地方史稿》,吉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相关研究论文可参见:韩绪耀《十六国时期的文化教育政策与民族融合》,《人文杂志》

2010年第1期;李凭《民族融合与制度创新——十六国北朝的历史轨迹》,《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5期;陈琳国《十六国时期的坞堡壁垒与汉人大姓豪族经济》,《晋阳学刊》2007年第3期;邓乐群《北魏统一中原前十六国政权的汉化先声》,《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1]。笔者认为单纯以汉化与否作为评价十六国政权的标准未免失之笼统。作为原西晋北方疆土新统治者的五胡政权,特别是占据汉族中原王朝政治统治中心洛阳、长安、邺的前赵、后赵、前燕、前秦等王国,其君主不断流露出取代中原王朝的雄心壮志,具有在中原立国建政的宏伟政治抱负,前秦甚至有试图统一华夏的实际行动(如前赵主刘渊起事前就发出“大丈夫当为汉高魏武,呼韩邪何足效成”的慨叹。参见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701页。后赵主石勒也自负颇高,自称“朕若逢高皇,当北面而事之,与韩彭竞鞭而争先耳。脱遇光武,当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2]。因此,十六国政权理应在北方区域内被看作西晋的实际继承者。所以,其政治作为更应被认为是在魏晋以来政治发展基础上,过渡到重新统一北方的北魏前,北方政治的一次新陈代谢。笔者不揣浅陋,拟以十六国时期北

收稿日期:2012-03-05

基金项目:厦门大学985工程重点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王明前(1971—),江苏苏州人,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

方政治与魏晋以来政治发展基础的继承关系为线索,对十六国政治进行新的梳理和归纳,以期增加学术界对十六国史的学术认知。

一 十六国政权对魏晋政治制度的沿袭

魏晋政治制度无论官制还是选举制度,都较两汉发生了显著变化。官制方面的最大变化是尚书省逐渐形成并取代司马、司徒、司空“三公”成为决策中心,中书省和门下省也在皇权强化的要求下产生,但“三公”仍然保有宰相地位和权力。在北方取代西晋的十六国政权积极沿用魏晋官制,其具体运作体现了上述魏晋官制的时代特点。

前赵主刘渊称帝,“以其子大将军刘和为大司马,封梁王。尚书令刘欢乐为大司徒,封陈留王。御史大夫呼延冀为大司空,封雁门郡公。宗亲以亲疏为等,悉封郡县王,异姓以勋谋为差,皆封郡县公侯”^[3]。继任者刘聪稍易其制,“以刘易为太尉,初置相国,官上公,有殊勋德者死乃赠之。于是大定百官,置太师丞相,自大司马以上七公,位皆上公……省吏部,置左右选曹尚书……以其子粲为丞相,领大将军,录尚书事,进封晋王”^[4]。前赵对魏晋官制的沿袭十分明显。尤其是丞相录尚书事的设置,是对魏晋官制变化新趋势的敏锐把握(省吏部设置选曹也是魏晋官制较两汉官制的新变化)。

后赵主石勒称赵天王,“署左长史郭敖为尚书左仆射,右长史程璜为右仆射领吏部尚书,左司马夔安……为尚书,署参军事徐光为中书令领秘书监”^[5],同样强化了尚书省的日常行政权力,并沿袭魏晋委近臣以中书令的成例。石勒后“令其太子省可尚书奏事,使中常侍严震参综可否,征伐刑断大事乃呈之”^[6],进一步加强中书省权力以求政由己出。

前秦主苻坚即位后以“兄法为使持节、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录尚书,从祖候为太尉,从兄柳为车骑大将军、尚书令,封弟融为阳平公……李威为卫将军、尚书左仆射,梁平老为右仆射,强任为领军将军,仇腾为尚书领选,席宝为丞相长史、行太子詹事,吕婆留为司隶校尉,王猛、薛赞为中书侍郎,权翼为给事黄门侍郎,与猛赞并掌机密”^[7]。苻坚沿袭魏晋以尚书省决策中枢的惯例,甚至掌握军权的大都督苻法和车骑大将军苻柳也必须加尚书衔。但同时更加注重强化更近内廷的中书省的决策权力。“王猛、薛赞为中书侍郎,权翼为给事黄门侍郎,与猛、赞并掌机密”即说明这一点。

可见,从前、后赵到前秦,十六国政权不仅沿袭了魏晋统治者强化君权,有意淡化“三公”而突出尚书省权力的行政方向,并且沿着政由己出的方向

强化中书省权力,这些都充分体现了魏晋官制的时代特点。

同时,十六国政权通过恢复魏晋以九品中正制为核心内容的选举制度,旨在有效争取地方社会资源,以求更合法地继承西晋覆灭后在北方留下的政治真空。后赵主石勒先“清定五品,以张宾领选。复续定九品。署张能为左执法郎,孟卓为右执法郎。典定士族,副选举之任。令群僚及州郡岁各举秀才至孝廉清贤良直言或勇士各一人”^[8],继而“以牙门将王波为记事参军,典定九流,始立秀孝试经之制”^[9],之后又“令公卿百僚岁荐贤良方正直言秀异至孝廉清各一人,答策上第者拜议郎,中第中郎下第郎中。其举人得递相荐引,广招贤之路”^[10]。所谓“清定五品”即先确定魏晋九品中正制的乡品第二至六品,在争取高门世族的支持后,继而在更广阔的社会阶层网络汉族士人^[11]。石虎继续石勒的行政努力,宣称“魏始建九品之制,三年一清定之,虽未尽弘美,亦缙绅之清律,人伦之明镜。从尔以来,遵用无改。先帝创临天下,黄纸再定。至于选举,铨为首格。自不清定,三载于兹,主者其更铨论,务扬清激浊,使九流咸允也。吏部选举,可依晋代九班选制,永为揆法。选毕,经中书、门下宣示三省,然后行之”^[12]。冉魏立国后,“清定九流,准材受任,儒学后门多蒙显进,于时合然,方之为魏晋之初”^[13]。前燕主慕容廆在辽东流亡士人中,“推举贤才,委以庶任”^[14]。前秦主苻坚令“公卿以下岁举贤良方正孝廉清才多略博学秀才异行各一人”^[15]。后秦主姚兴,“令郡国各岁贡清行孝廉一人”^[16]。后燕主慕容宝“校阅户口,罢诸军营分属郡县,定士族旧籍,明其官仪”(但另据《资治通鉴》,慕容宝“定士族旧籍,分辨清浊,校阅户口,罢军营封荫之户,悉属郡县。由是士民嗟怨,始有离心”。亦有通过检阅户口,与士族争夺国家编户的目的,参见《资治通鉴》第3428页)^[17]。慕容盛“引见百僚于东堂,考评器艺,超拔者十有二人。命百司举文武之士才堪佐世者各一人”^[18]。

以上恢复对以九品中正制为核心内容的选举制度的努力,固然有争取中原士族支持五胡新政权的直接动机,也确实取得一定积极效果。如后赵石虎时,“镇远王摧表雍秦二州望族自东徙来,遂在戎役之例,既在衣冠华胄,宜蒙优免,从之。自是皇甫胡梁韦杜牛辛等十有七姓蠲其兵贵,一同旧族,随才铨叙,恩叙分还桑梓者听之”^[19]。又如“汾阳薛氏聚众族党,阻河自固,不仕刘、石。及苻氏兴,乃以礼聘薛疆,拜镇东将军”^[20],从而归顺五胡政权。但是,此举仍然不乏以上入主中原的五胡政权张扬其统治

正统性和合法性的深谋远虑。魏晋九品中正制以道德评价作为选荐人才的首要标准,因此注重乡评即基层社会名流的舆论导向。此制从曹魏发端发展到西晋,在中央由司徒府负责典选,各州郡县均设中正,从而在中央朝廷与地方名流之间建立起社会合作的机制。由于通过这种制度选拔官员并不仅仅出于功利目的,而是着眼于培养地方社会对五胡政权的政治忠诚,因此对九品中正制为代表的选举制度的恢复,有助于上述新政权对正统统治地位的追求和确立。尽管入主中原的十六国政权大多建政短促,其恢复选举制度的行政努力最终无补于其灭亡命运,但并不能因此轻易否定这一行政方向的历史价值。

二 以“儒家化”为方向的文化建设与法制建设

虽然十六国政权多为游牧民族建立,但是由于从东汉开始匈奴、羌等族便开始内附中原王朝,其统治者纷纷接受中原王朝官爵册封,并需向朝廷送质子换取政治信任,因此在对中原汉族政治文化的耳濡目染中,各族统治者无不倾慕以儒学为精神特质的汉族文化。于是,继承西晋北方统治地位的五胡政权在很自然地沿袭魏晋政治制度的同时,推行以“儒家化”为方向的文化建设,尤其着力对上层贵族子弟的儒学教育。

前赵主刘曜“立太学于未央宫西,简百姓二十五以下十三以上神志可教者十五人选朝贤宿儒明经笃学以教之”^[21]。后赵主石勒“亲临小学考诸学生经义,尤高者赏帛有差”^[22]。他还要求“郡国立学宫,每郡置博士祭酒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修成,显升台府。于是擢拜太学生五人为佐著作郎,录述时事”^[23]。石虎则在石勒建立大学、小学的基础上,“令诸郡国立五经博士”,并且“复置国子博士助教”,进一步恢复魏晋教育体制。

前燕主慕容廆以世子觚“率国胄束修受业”。他本人“览政之暇,亲临听之,于是路有颂声,礼让兴矣”^[24]。慕容觚“赐其大臣子弟为官学生者号高门生,立东庠于旧宫。以行乡射之礼,每月临视,考试优劣”。他本人也“雅好文籍,勤于讲授,学徒甚盛,至千余人”,并亲身垂范,“亲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诫十五篇以教胄子”。他还“亲临东庠考试学生,其经通秀异者擢充近侍”^[25]。

前秦主苻健“薄赋卑官,垂心政事,优礼耆老,修尚儒学,而关右称来苏焉”^[26]。十六国最难得的一段和平安定局面是由苻坚实现的。“坚亲临太学,考学生经文上第擢叙者八十三人。自永嘉之乱,

庠序无闻,及坚之僭,颇留心儒学。(王)猛整齐风俗,政理称举,学校渐兴”^[27]。他宣称要“增崇儒教,禁老图讖之学”,要求“太子及公侯百僚之子皆就学受业,中外四禁二卫四军张上将士皆令受学。二十人给一经生,教读音句,后宫置典学以教掖廷,选阉人及女隶敏慧者皆博士授徒”^[28]。后秦主姚萇“下书另留台诸镇各置学官,勿有所废,考试优劣随才擢叙”^[29]。成汉主李雄“兴学校,置史官,听览之余,手不释卷”^[30]。南燕主慕容德“建立学宫,简公卿以下子弟及二品士门二百人为太学生”^[31]。

凉州地区自汉代就有崇尚儒术之风,故五凉政权纷纷浸染与斯。前凉主张轨“课农桑,拔贤才,置崇文祭酒,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以教之”^[32]。西凉主李暠“立泮宫,增高门学生四百人”(《晋书》为“五百人”,参见《晋书》,第2259页)^[33]。甚至盘踞河西偏僻边地的南凉主秃发利鹿孤也接受士人史皓“宜建学校开庠序,选耆德硕儒以训胄子”的建议,“以田玄冲赵诞为博士祭酒,以教胄子”^[34]。

虽然以上十六国君主推行的儒学教育均为贵族子弟教育,是对汉以来太学教育体系的恢复,但是通过提高贵族集团的儒学素质,有助于他们入主中原后与汉族士人阶层的社会合作,并巩固对中原政治制度沿袭运用的效果。在儒学教化的浸染下,各国统治者普遍效法前朝开明政治,其施政尽显“儒家化”风范。这方面以前秦最为典型。苻健立国之初,“勤于政事,数延公卿,咨讲治道,承赵人苛虐奢侈之后,易以宽简节俭崇礼儒士,由是秦人悦之”^[35]。苻坚于大旱之年,“减膳撤乐,命后妃以下悉去罗纨,开山泽之利,公私共之,息兵善民,旱不为灾”^[36]。

为迅速建立封建统治,一方面维护五胡政权对主体民族外的各民族的统治,一方面克服游牧民族落后的政治积习,十六国政权在沿袭魏晋政治制度,致力于“儒家化”方向的教育文化建设的同时,也十分注重法制建设。后赵主石勒“下书曰:今大乱之后,律令滋烦,其采集律令之要,为施行条制。于是命法曹令史贯志造辛亥制度五千文,施行十余岁,乃用律令”^[37]。石勒的法制建设是在经过一个时期的试行之后才通行全国,这说明石勒对法制建设持审慎态度。所谓“采集律令之要”,是对前代法律的继承。在法律实施的过程中,石勒力求慎重。他表示:“自今诸有处法,悉依科令。吾所忿戮,怒发中旨者,若德位已高,不宜训罚,或服勤死事之孤,邂逅罹讖,门下皆各列奏之,吾当恩择而行也。”^[38]

在法制建设上成就最卓著的十六国君主当属前秦主苻坚。他倚重的汉臣王猛以执法严厉著称。王

猛在任始平令时,“明法峻刑,澄察善恶,禁勒强豪”。面对苻坚“为政之体,德民为先,莅任未几,而杀戮无数,何其酷也”的质询,王猛答以“宰宁国以礼,治乱邦以法”^[39]。在王猛与氏族豪强樊世发生冲突时,苻坚果断处决骄横的樊世,树立王猛的威信,以至于“公卿以下无不惮猛焉”。在王猛诛杀氏族豪强强德后,“百僚震肃,豪右屏气,路不拾遗,风化大行”,令苻坚感叹“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天子之为尊也”^[40]。

其他十六国君主也十分重视法制建设。后秦主姚兴严厉整肃吏治和治理腐败。“始平太守周班、槐里令李青皆以黠货诛,于是郡国肃然矣”。他下令“百僚举殊才异行之士,刑政有不便于时者皆除之”。他亲自主持立法工作,认真研究兵部郎边熙“军令烦苛,宜遵简约”的条陈,要求“依孙吴誓众之法以损益之”。为培养官员依法理政的意识,他“立律学于长安,召郡县散吏以授之。其通明者还之郡县,论决刑狱,若州郡县所不能决者,谏之廷尉”。他本人还经常“临谏议堂听断疑狱,于时号无冤滞”^[41]。后燕主慕容盛“每十日一自决狱,不加拷掠,多得其情”^[42]。他严厉制裁以金代罚的司法腐败,“下诏曰:法例律,公侯有罪,得以金帛赎,此不足以惩恶而利于王府,甚无谓也。自今皆令立功以自赎,勿复输金帛”^[43]。北燕主冯跋“命尚书纪达为之条制,每遣守宰必亲见东堂,问为政事之要,令极言无隐,以观其志。于是朝野竞劝焉”^[44]。北凉主沮渠蒙逊命姚艾、房咎“撰朝官制”以整肃朝纲,“行之旬日,百僚振肃”^[45]。

相比之下,成汉的法制建设比较薄弱。李雄“意在招致远方,国用不足,故诸将每进金银珍宝,多有以得官者”。或许是由于成汉统治集团出身流民,整体文化素养低下,因此才有“雄为国无威仪,官无禄秩,班序不别,君子小人服章不殊”这样差强人意的现象^[46]。其实,法制建设与文化建设相辅相成,互为表里,彼此具有互补性。如前秦主苻坚不仅强调依法理政,而且重视官吏的学识修养。“秦王坚诏:关东之民,学通一经,才成一艺者,在所以礼送之。在官百石以上,学不通一经才不成一艺者,罢遣还民”^[47]。法制建设因而有效巩固了十六国政权“儒家化”文化建设的成果。

三 以重农为方向的魏晋经济政策的延续

魏晋时期,被汉末战乱严重摧毁的社会生产力逐渐得到恢复。曹魏政权一方面通过政府主导的屯田制蓄积军事斗争必需的粮食,另一方面致力于对私有小农经济的恢复,从而为西晋的统一奠定了物

质基础。西晋在废除屯田制后,通过颁布占田法令,确立土地私有制,一方面鼓励私有小农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默认士族豪强庄园经济扩张的现状。同时,在税制方面,魏晋改变汉代在田赋外按人头征收货币形式的算赋和口赋的征收办法,而改为按户征收实物调捐。

最初入主中原的前、后赵政权由于对汉族中原王朝怀有民族仇恨,因此曾经给中原农业经济造成严重破坏。但后赵主石勒在稳定对中原王朝政治中心的统治后,随着追求正统性政治抱负的提高,很自然地开始继续魏晋以重农为方向的经济政策。石勒“以幽冀渐平,始下州郡阅实人户,户资二匹,租二斛”^[48]。所谓“幽冀渐平,始下州郡阅实人户”是恢复农业生产的前提,而“户资二匹,租二斛”的征收则是以农业生产的初步恢复为基础。石勒还“以民始复业,资储未丰,于是重制禁酿,郊祈宗庙,皆用醴酒”^[49],坚决贯彻爱惜民力的重农宗旨,并有意识克服游牧民族的嗜酒恶习。

前燕主慕容廆以“稼穡者,国之本也,不可以不急”作为“家令”之一^[50]。慕容皝采纳谋士封裕的建议,革除苛政,以魏晋标准加以改良。封裕规劝慕容皝“宜省罢诸苑以业流人,人至而无资产者赐之以牧牛”。他建议恢复魏晋时期的赋税标准“魏晋虽道消之世,犹削百姓不至于七八,持官牛田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与官中分,百姓安之,人皆欢乐。”他希望慕容皝继续西晋禁止游食商贩的劝农政策“今中原未平,资畜宜广,官司猥多,游食不少,一夫不耕,岁受其饥。必取于耕者而食之,一人食一人之力,游食数万,损亦如之,安可以家给人足,治致升平。”因此,“司战务农,尤其本也,百工商贾尤其末耳。宜量军国所需,置其员数,以外归之于农,教之战法,学者三年无成,亦宜还之于农,不可徒充大员以塞聪俊之路”。慕容皝颇以为然,表示“农者,国之本也,而二千石令长不遵孟春之令,惰农弗劝,宜以尤不修辟者措之刑法,肃厉属城。……苑悉列罢之,以给百姓田业者。贫者全无资产,不能自存,各赐牧牛一头。若私有余力,尽取官牛垦官田者,其依魏晋旧法……中州未平,兵难不息,勋诚既多,官僚不可以减也……百工商贾数,四佐与列将速定大员,余者归农。学生不任训教者,亦除员录”^[51]。慕容皝基本采纳了封裕的意见,尤其强调“依魏晋旧法”。虽然从官、私牛的不同征收比例可看出前燕的改良不过是把苛重的赋税减少到曹魏屯田制六四或五五分成的比例水平,但是作为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政权,能够做到主动按照前朝旧制劝课农桑、减轻苛重赋税已殊为难得。关于禁游

食商贩的议论在西晋时就很激烈,说明即便是拥有统一局面的西晋也并未很好解决农业问题,这样看来,前燕统治者的表现充分体现出其尊重历史经验的政治胸怀(相比之下,成汉的赋税较轻,“其赋男丁岁各三斛,女丁半之,户调绢不过数丈,帛数两”,因此“事少役稀,百姓富实,间门不闭,无相侵盗”。这当与成汉君主出身流民有关)^[52]。

其他十六国君主也都能贯彻以重农为方向的经济政策。前凉主张重华“轻赋敛,省园苑,以恤贫穷”^[53]。后燕主慕容垂任用慕容农为幽州牧,(慕容)农于是创立法制,事从宽简,清刑狱,省赋役,劝课农桑,居民富赡,四方流民前后至者数万口^[54]。北燕主冯跋“励意农桑,勤心政事,乃下书省徭薄赋,墮农者戮之,加田者褒赏”^[55]。即使是在荒僻河西立国的南凉主秃发乌孤也能够“养民务农,修结邻好”^[56]。

当然,北方长期割据纷争的局面使五胡政权自然会沿袭曹魏和晋初的屯田制以解决紧迫的军事勤务问题。后赵主石虎“使典农中郎将王典帅众万余屯田海滨”^[57],准备对前燕的战争。后秦主姚襄也在创业之初,“屯历阳,以燕秦方强,未有北伐之志,乃夹淮广屯田,训厉将士”^[58],静待时机。

四 “胡汉分治”和分封制对中央集权的削弱

作为入主中原的五胡政权,在继承和弘扬西晋在北方继承者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地位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有意识强调本民族的统治地位。五胡政权对占人口大多数且文化先进的汉族,以及其他与统治民族文化相近并且与之部分融合的所谓“杂胡”,采用“胡汉分治”政策。这种政策更多地与封建分封制相联系,而并非采用中原王朝习惯的郡县制。

前赵主刘渊即开始在中原官制外另外设立单于台机构,以“楚王聪为大司马大单于,并录尚书事。置单于台于平阳西……始安王曜为征讨大都督,领单于左辅,廷尉乔智明为冠军大将军,领单于右辅”^[59]。刘聪进一步“置辅汉都护中军上军辅军镇卫京前后左右上下军辅国冠军龙骧武牙大将军,营各配兵二千,皆以诸子为之。置左右司隶各领户二十余万,万户置一内史,凡内史四十三。单于左右辅,各主六夷十万落,万落置一都尉”^[60]。刘曜迁都长安后,拜刘胤为大司马,“以汉阳诸郡十三为国,置单于台于渭城,拜大单于,置左右贤王以下皆以胡羯鲜卑氏羌豪桀为之”^[61]。从刘渊到刘曜,前赵政权首先建立封建分封制,类似西晋武帝分封宗室为王公后形成郡国领兵制,以各类杂号将军衔配备一定兵员,“以诸子为之”屏藩皇室。其次,前赵政权

建立胡汉分治的地方行政系统统驭民众,实行双轨制。所谓“置左右司隶各领户二十余万,万户置一内史,凡内史四十三”指按照郡县制方式在中原王朝政治中心区管理被征服的汉族民众;相应地,通过移植游牧民族特点的单于制,设置单于台,之下或置单于左右辅,或置左右贤王,“主六夷”或“以胡羯鲜卑氏羌豪桀为之”,即统治非汉族的统治民族匈奴屠各外的各民族。

后赵主石勒的措施与前赵相近,“依刘备在蜀魏王在邺故事,以河内……十一郡并前赵国、广平……十三郡合二十四郡,户二十九万为赵国,封内依旧改为内史……以大单于镇抚百蛮”^[62]。石勒刻意强调羯族的特权地位,以“中垒支雄游击王阳并镇门臣祭酒,专明胡人辞讼,以张离……等为门生主书,司典胡人出入,重其禁法,不得侮易衣冠华族,号胡为国人”^[63]。后赵的地方行政,其掌管汉人事务的部分明显为郡县制设置,并且仿照魏晋成例先设立赵国,在达到填补西晋在北方政治真空的目的后,再“以大单于镇抚百蛮”,从而实现胡汉分治的行政二元化布局。石勒虽然对胡人即羯族作出“重其禁法,不得侮易衣冠华族”的姿态,但同时又“号胡为国人”,其民族独尊意图依旧昭然(即使是短命的汉族政权冉魏主冉闵,也“署其子太原王胤为大单于骠骑大将军,以降胡一千配之为麾下”。这说明在民族混杂的北方,即使是汉人政权也无法避免胡汉分治的行政定势)^[64]。

前秦主苻坚统一北方后,为巩固对庞大多民族帝国的统驭,一方面将前燕、前凉王室成员以及鲜卑、羌族豪酋整体移民到关中腹地加以监视,并委以重任;另一方面推行宗室出镇制度,把本居住于关中的氏族兵民整体随宗室出镇各战略要地。他鉴于“关东地广人殷,思所以镇静之。引群臣于东堂议曰:凡我族类,支胤弥繁,今欲分三原、九嵕、武都、汧、雍十五万户于诸方要镇,不忘旧德,为磐石之宗……于是分四帅子弟三千户以配苻丕镇邺,如世封诸侯为新券主……于是分幽州置平州,以石越为平州刺史,领护鲜卑将军幽州刺史中郎将镇龙城,大鸿胪韩胤领护赤沙中郎将,移乌丸府于代郡为平城,中书令梁说为安远将军幽州刺史镇蓟城,毛兴为镇西将军河州刺史镇包罕,王腾为鹰扬将军并州刺史领护匈奴中郎将镇晋阳;二州各配支户三千。苻晖为镇东大将军豫州牧,镇洛阳;苻睿为安东将军雍州刺史镇蒲坂”^[65],从而实现“分三原、九嵕、武都、汧、雍十五万户,使诸宗亲各镇之,散居方镇,如古诸侯”的政治格局^[66]。这次分封的意图还未及消化,前秦就因南征东晋的失败而崩溃,因此史学界对此

多持否定意见,认为此举削弱了前秦在关中腹地政治核心区的统治力量,直接导致前秦的覆亡。其实,苻坚对几个政治中心如邺、洛阳和拱卫长安的蒲坂的确派出苻氏家族的嫡亲出镇,所统辖的想必也是十五万户氏族兵民。但龙城、蓟城、晋阳等均不是苻氏驻节,是否仍然统领氏族兵民便值得商榷。而且结合淝水之战后苻坚在长安败亡,而苻丕仍然得以在邺和晋阳延续王祚,并延续到苻登继位与后秦长期相持的史实,也可反证此政策并非绝对无效。问题恐怕还是在于苻坚对鲜卑、羌族上层过于宽容,仍然让他们保有对本民族的政治影响力,尤其是对本民族部众的军事指挥权,以换取他们对南征的支持,这样就使前秦强制迁徙鲜卑、羌族豪酋于关中加以监视的效果,因氏族兵民随宗室出镇而抵消。对于前秦来说,以五胡之一的氏族统治广袤的北方疆土和人口占绝对优势的各族民众,除了笼络氏族外各民族上层,同时加强对几个政治中心区的直接控制外,别无他法。苻坚分封制的行政方向本身并不为过,只是具体操作环节上由于苻坚本人的政治性格,特别是由于分封政策还未来得及深入到地方行政层面,就淹没在南征失败带来的国家板块的全面崩溃之中。

总之,五胡十六国政权在地方行政上的“胡汉分治”和分封政策,并不能够强化和巩固中央集权,反而削弱了各王国的中央权威,加速了各国的灭亡。有论者认识到,五胡国家的主体部落不足和其他胡人部落之间的互动,是各国政治文化变化的一个主轴,直接决定了五胡诸国间国运短促的命运^[67]。亦有论者认为宗室血缘是这种分权体制的基础,而这又和寻求极权的帝王形成复杂的矛盾^[68]。但是实际上,魏晋中原王朝也同样没有能够解决这一问题。曹魏幽闭宗亲,使封国制度无法屏藩皇室。西晋吸取曹魏教训,废州郡领兵制代以宗亲郡国领兵制,结果反而使短暂的统一局面迅速毁灭于八王之乱。继承西晋北方统治的五胡十六国,由于建政短促,更由于各国均是以人口绝对少数甚至文化落后的民族,统驭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汉族等民族,其推行中原郡县制的难度自然加大,乞灵于来自现成部落遗存的封建分封制便顺理成章,封建制成为无法避免的选择。而这种客观上只能削弱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又只能通过军事暴力加以维系。一旦这种军事暴力的威慑丧失,这个王朝的统治就必然崩溃(只有前燕主慕容廆成功避免了上述恶性循环。慕容鲜卑的崛起得益于其对南渡晋室的道义支持,使辽东成为汉族士人躲避中原战乱的乐土。因此,“时二京倾覆,幽冀沦陷,廆刑政修明,虚怀引纳,流亡士庶多襁负归

之”。慕容廆因势利导,“立郡以统流人,冀州人为冀阳郡,豫州人为成周郡,青州人为营丘郡,并州人为唐国郡”。这竟与南渡晋室的侨置州郡不谋而合。参见《晋书》,第2806页。另有南凉主秃发利鹿孤采纳俞允文建议,“处晋民于城郭,劝课农桑以供资储,帅国人以习战射”,也是一种胡汉分治的形式,而且充分体谅了胡汉民族在生产方式上的差异。但是慕容廆尚未入主中原,秃发利鹿孤偏居河西,均不具备典型意义)^[69]。

五 十六国时代留给后世的历史难题

虽然十六国政权尤其是入主中原的几个王国纷纷以西晋在北方的继承者自居,因而倾心于以“儒家化”为方向的文化建设,沿袭魏晋政治制度,经济政策也力求贯彻重农原则,但是其整体表现在历史上仍然难以得到好评,反而留下“五胡乱华”的恶名。这一评价尽管并不公允,但至少是有事实根据的。如后赵主石虎时期,“众役烦兴,军旅不息,加以久旱,谷贵,金一斤直米二斗,百姓嗷然无生赖矣”^[70]。恢复商品经济的努力也归于失败。后赵主石勒“令公私行钱,而人情不乐,乃出公绢市钱,限中绢匹一千二百,下绢八百。然百姓私买中绢四千,下绢二千,巧利者贱买私钱,贵卖于官,坐死者十数人,而钱终不行”^[71]。频繁的战乱必然带来巨大的生产倒退和社会破坏,但是五胡政权经济政策的失误难辞其咎。虽然五胡政权纷纷宣称要“劝课农桑”,也切实执行过重农政策,但是游牧民族的积习和统治民族的倨傲感使他们经常丧失贯彻重农经济政策的耐心,从而陷入贡役制的暴政中。如后赵主石虎将讨伐慕容鲜卑,“令司冀清徐幽并雍兼复之家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合邠城旧军满五十万具船万艘白河通海运谷豆干一百万斛于安东城,以备征军之用”,以至于“百姓失业十室而七”^[72]。入主中原的政权尚且如此,由于地理环境的制约,地处荒僻边地的政权就更可能采取贡役制的赋税政策。如陇西鲜卑建立的西秦担忧被征服的乙弗鲜卑“终为边患,税其部中戎马六万匹”^[73],当为贡役制性质。因此,一方面深知重农的长远政治效益,另一方面却又无法克制超经济强制的贪欲,这成为五胡政权留给后世的历史悖论(上述弱点有可能在特定条件下,通过时间的磨蚀和安定环境的滋养而逐步弥补。如前凉主张轨时代,凉州曾出现“立制准布用钱,钱遂大行,人赖其利”的局面。参见《晋书》,第2226页。但这得益于河西独特的地缘政治环境。地处东西方贸易枢纽的地理位置和多民族交往的需要决定其必须需要货币媒介)^[74]。

于是,这种军事贡役制对重农政策的干扰和破坏,使西晋时代本来就受到压抑的私有小农经济丧失殆尽,而庄园经济却因为其根深蒂固的封闭性和地方性而得以存活。成汉太子李班曾痛陈“今贵者广占荒田,贫者种植无地,富者以己所余而卖之,此岂王者大均之义乎”^[75]。尽管庄园经济的处境也远比西晋统一王朝时代艰难,但是由于与五胡各族贵族豪酋合流,从而成为阻碍各五胡国家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强大阻力。因此,“在东汉末年孕育出来的以宗族乡里的地方势力的基础的堡坞豪帅与官僚士大夫在此时期并未丧失其权利,相反他们在异族豪酋的保护下进一步发展了以大族为主的封建割据势力,主要表现在堡坞主大抵被委任为地方官及汉族士大夫之参加各族政权”^[76]。前赵时期,“河内督将郭默收整余众,自为坞主”^[77]。魏浚则“屯洛北石梁坞”,其族子魏该“聚众据一泉坞”^[78]。后赵主石勒扫荡华北,“王师已还,河北诸堡壁大震,皆请降送任于勒”^[79]。前秦主苻坚与西燕主慕容冲踞战于长安,“有堡壁三十余,推平远将军赵敖为主,相与结盟,冒难遣兵粮助坚”^[80]。如此堡壁林立的现象居然就出现在前秦政治的腹心地区。但是,五胡与汉族地方势力的合作毕竟是权宜之计,之间的联盟纽带终究是脆弱的,存在着尖锐的利益争夺。五胡政权与地方豪强之间争夺国家编户的斗争便是这一矛盾的反映。前燕地方豪强控制大量国家编户,“贵戚多占民为荫户,国之户口少于私家,仓库枯竭,用度不足”。前燕主慕容暉任用悦绾“纠搃奸伏,无敢藏匿,出户二十余万举朝怨怒”^[81],可见地方豪强之强大。地方豪强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后秦主姚兴“以国用不足,增关津之税,盐竹山木皆有赋焉”,并对反对意见以“能逾关梁通利于山水者,皆豪富之家。吾损有余以裨不足,有何不可”加以反驳^[82]。南燕主慕容德为丰裕国课,与青州豪族争夺劳动力,“遣其车骑将军慕容镇率骑三千,缘边严防,备百姓逃窜,以(韩)卓为使持节、散骑常侍、行台尚书巡郡县隐实,得荫户五万八千”^[83]。但是如果庄园主能够依托其军事堡垒阻挡住五胡政权的军事打击,那他们就可以通过获得五胡政权的政治默许而得以维护其在地方社会的地位。如成汉主李雄为争取以范长生为代表的巴蜀士人的支持,“以范长生为天地太师,复其部曲,皆不豫征税”^[84],加意恩遇。因此,地方社会的坞堡化和庄园经济的顽强存在,是十六国留给后世的又一个历史难题。

另外,虽然五胡政权为填补西晋灭亡后在北方留下的政治真空,承担西晋在北方继任者的政治地位,不仅沿袭魏晋官制和以九品中正制为核心的选

举制度,而且着力加强“儒家化”方向的文化建设,几乎与南渡的东晋同时固化着腐朽的士族门阀制度,但是对统治民族贵胄子弟的儒学教育却无法彻底根除其固有的民族复仇情绪和统治民族的倨傲感。正如前赵宗室刘演鼓动刘渊起事时所论“晋为无道,努力御我……今司马氏父子兄弟自相鱼肉,此天厌晋德,授之以我”^[85]。石勒礼遇士人的善举无法消弭冉闵煽动的民族复仇,苻坚对鲜卑、羌族的恩柔也无法换来慕容氏和姚氏的政治忠诚。于是这便给十六国的历史继任者一个历史难题:如何在入主中原,统治人口远远超过统治民族自身的汉族和“杂胡”时,在接受中原汉族政治制度和农业生产方式的同时,仍然能够使统治民族自身得到政治合法性,即汉族和杂胡的承认。这不仅是留给统一五胡十六国的北魏的历史难题,也是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定数。

参考文献:

- [1]冯君实:十六国官制初探[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4):95-101.
- [2]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709.
- [3]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665.
- [4]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665.
- [5]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745.
- [6]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750.
- [7]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884-2885.
- [8]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736.
- [9]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746.
- [10]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748.
- [11]张旭华.后赵九品中正制杂考[M]//张旭华.九品中正制略论稿.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247-260.
- [12]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764.
- [13]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794.
- [14]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806.
- [15]崔鸿.十六国春秋[M].北京:中华书局,1985:20.
- [16]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977.
- [17]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3093.
- [18]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3093.
- [19]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770.
- [20]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3436.
- [21]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688.
- [22]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741.
- [23]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751.
- [24]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806.
- [25]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826.
- [26]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781.
- [27]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895.
- [28]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3270.
- [29]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971.
- [30]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3040.

- [31]房玄龄. 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3168.
- [32]崔鸿. 十六国春秋[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45.
- [33]崔鸿. 十六国春秋[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51.
- [34]房玄龄. 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3146.
- [35]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3143.
- [36]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3169.
- [37]房玄龄. 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2730.
- [38]房玄龄. 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2747.
- [39]房玄龄. 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2930.
- [40]房玄龄. 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2886 – 2887.
- [41]房玄龄. 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2980.
- [42]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3487.
- [43]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3492.
- [44]房玄龄. 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3130.
- [45]房玄龄. 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3198.
- [46]房玄龄. 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3040.
- [47]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3256.
- [48]房玄龄. 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2724.
- [49]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2890.
- [50]房玄龄. 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2808.
- [51]房玄龄. 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2823 – 2825.
- [52]房玄龄. 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3040.
- [53]房玄龄. 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2240.
- [54]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3356.
- [55]房玄龄. 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3130.
- [56]崔鸿. 十六国春秋[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53.
- [57]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3021.
- [58]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3133.
- [59]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2749.
- [60]房玄龄. 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2665.
- [61]房玄龄. 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2698.
- [62]房玄龄. 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2730.
- [63]房玄龄. 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2735.
- [64]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3108.
- [65]房玄龄. 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2903.
- [66]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3294.
- [67]陈勇. 汉赵史论稿——匈奴屠各建国的政治史考察[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19.
- [68]谷川道雄. 隋唐帝国形成史论[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249.
- [69]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3517.
- [70]房玄龄. 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2764.
- [71]房玄龄. 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2738.
- [72]房玄龄. 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2770.
- [73]房玄龄. 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3125.
- [74]赵向群. 五凉史探[M].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6: 241.
- [75]房玄龄. 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3041.
- [76]唐长孺. 晋代北境各族“变乱”的性质及五胡政权在中国的统治[M]//唐长孺.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180.
- [77]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2749.
- [78]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2764.
- [79]房玄龄. 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2711.
- [80]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3345.
- [81]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3210.
- [82]房玄龄. 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2994.
- [83]房玄龄. 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3170.
- [84]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2720.
- [85]房玄龄. 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2648.
- 【责任编辑 周永军】**